在“宫”里招待鲁迅先生

先要说一段历史经过：那是1934年年初，我和胡风同居在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三层楼里。由于房子破旧，我们又是新婚，家里给我做了两床被子，我们买了床和一桌四凳，书桌是借用房东的旧物。但我感到墙壁太脏太晦色了，就跑到纸店选购了一种浅天蓝色的薄光纸，将四壁糊了一下，这样看上去就显得很幽雅明亮，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那时这间房经常作为左联开会之用，周起应（周扬）等同志常在这里开会。有时周扬同志还一早来通知胡风在什么地方开会。遇到我们吃早点，自己煮的麦片粥，就留他也吃上一碗。当时散装麦片，只二角钱一斤。

这样的房子，这样的生活，那时在上海只能算中下等的，却有一位先生说胡风结婚时的房子像皇宫一样富丽，还被登在一本日文刊物上。这本日文刊物被鲁迅先生看到了，于是就奇文共欣赏，告诉了胡风，胡风也就告诉了我，还将鲁迅先生给他看的32开本的日本刊物给我看了，我们真是啼笑皆非！因此后来鲁迅先生在给胡风写信时，最后常用“此请‘皇安’”来风趣一下。

直到1935年初秋，我们才想到请鲁迅先生来家吃一次饭，同时也看看我们的“皇宫”。但那早已不是那间小楼了，现在这间房，在我们来说，实在是富裕到惶惶然。因为我们已有了“皇子”，同时胡风的七十多岁的老父又一直说要到上海来看十年未见的儿子，我们不好拒绝，就为他准备了一间房子。所以这是一间厢房楼，还有一间后厢房。我们想这样阔绰的住处，在我们是不太容易的，几乎要用去胡风稿费收入的一半。该趁此机会，在这宽大的房子里，请鲁迅先生来家做一次客吧。

说到请客，在我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请鲁迅一家来做客，对我们更是不知如何办才合适。我在家时，从来对烹调等家务事不感兴趣。记得和胡风同居后，第一餐饭菜，是白肉煮黄芽白（大白菜），这顶容易做，菜熟了加上盐就可以吃。第二餐呢，就是黄芽白加肉片了。吃了三天，还是我妹妹来教我，才学会做另一样菜。好在胡风不挑嘴，他本人是连洗菜、洗碗筷都干不来，有现成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菜可吃，他只是高兴地满意地大口大口地吃，一直到吃光为止。因此我也就无法提高，练出真本领来。但我的二妹可喜欢搞家务，向我母亲学了一点烧菜的本领。这样我就决定请她来当掌勺的，我做她的助手，听她的吩咐，买了她所需要的材料。当时她报的菜名有七八样之多。胡风在旁边一再地说，弄简单点，弄得精致好吃点。但我们可觉得应该有冷盘、有热炒，还应该有全鱼、炖肉等。结果菜倒真是弄了一桌子。

下午三时许，我们从后厢房窗口，看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带着海婴一道来了。胡风赶快下楼去迎接，引他们到我们的卧室前厢房看了一下，就请到作为胡风书房的后厢房里坐了。书房虽小，十来平方米的样儿，除了一张书桌，两把藤椅，两个竹书架之外，就别无他物，所以显得宽敞明亮。从前房搬两张圆凳去，四人坐坐倒也还舒坦。

那天正是秋高气爽之时，阳光很好，但又暖热适中。我们选中的房子，后面有很宽的弄堂，面临着一家外国人住的公寓，所以托福小摊贩不让进来，很是安静。

鲁迅先生穿一身深灰色的长衫，还是戴着他那帽檐下垂的礼帽。许先生穿得也很朴素，记得是淡灰色有浅花的旗袍。海婴穿一身浅色的童装，可能是日本服装店定做的，非常合体，显得十分精神，活泼可爱。这一家人来到我们这陋室，不能不用一句俗话说“蓬筚生辉”了。使我们感到这屋子一下子豁亮了，充满了和蔼高尚的气氛。

那天大家都是心情舒畅，十分愉快。尤其是海婴特别听话，只是用两只明亮的眼睛四处张望，看来他对任何事物都感到稀奇好玩。我们为他们虽也准备了糖果瓜子等，可这一些海婴并不怎么感兴趣，倒是对我们的还不到一周岁的孩子特别感兴趣，老逗他玩，要妈妈抱他。孩子在拍手又叫又笑的时候，他也高兴得大笑了，并且欢快地说：“好白相啦！爸爸、妈妈你们看……”因此屋里显得很热闹，洋溢着愉快的笑声。

鲁迅先生为我的孩子带来了三件礼物，从这里可以看出是经过先生用心挑选的。那是从日本人开的百货公司买来的。一盒是日本制的果酱夹心饼干，是很松脆的一种，当时上海市面上还未见到呢。就是像现在的巧克力维夫夹心饼干那样儿，到口即化，给孩子吃，既富于营养又易消化，是用橘黄色有美丽图案的铁盒装着。这个盒子我一直保存着，用来装我们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等（在发还我们的财物当中，它还依然存在!）。一只赛璐珞的能摇摆的玩具娃娃，还有一个木制的

小鸟，尾部有一个哨子，可以吹响。赛璐珞玩具没能玩好久，就散架了。那木制小鸟可一直玩到我们“八一三”离开上海，还收藏在我孩子装玩具的篮子里。到抗战胜利后，我生了第三个孩子，他还玩过。不过小鸟的头已经脱落，不能称其为鸟了，孩子用它当手榴弹甩。可惜后来不知道被他甩到哪里去了。

这三件礼物，不能说它们是高贵的精致的礼品，但可顶适合一岁来大的孩子玩，没有棱角，不会伤到自己或别人，又不易藏污垢，容易揩抹清洗，顶合乎卫生。从这些方面看来，是花了先生一番心血去选购的，它们在我们心中就比任何珍贵的礼品更珍贵了！

刚满二十岁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主妇，招待这几位不寻常的客人，我实在有点惴惴然。因为我对他们比对一般的长辈更尊重、更敬爱，真不知怎样来表达这份心情，结果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和幼稚，除了倒茶之外，我连一句应酬话都说不出来。好在许先生非常慈爱，好像看出了我的怯生生的心情，就主动找话问我，并且和我谈起了带孩子的情况。我抱了孩子给她看，她就从我手中接了过去，逗孩子笑，逗孩子说话。我那不到一岁的孩子，不能走路，可能发四五个字的音，除了会叫爸爸妈妈，还会问“几点钟了？”说“起来”、“吃饭”、“上街白相”等话，加上海婴高兴的笑声，我们几个倒玩得很热闹很融洽。鲁迅先生有时在听到我们的笑声时，会投来亲切的一瞥。

快到五点时，我抱孩子下去，就忙开了我们厨房里的工作。我妹妹简直想拿出全副本领来显一显，要把冷盘拼出花样来，又忙着炒菜。我在前屋摆好了桌子，正好我们仅有的六张椅子够用，就请他们入席了。怎样安排座位，怎样招待喝酒吃菜，我是顾不来了，就由胡风去应付了。记得喝的是黄酒，我也不知道酒好不好，热得有没有过火，反正我是尽力而为。客人倒是很高兴，不受任何拘束。尤其是海婴更感到特别好玩，问这问那的，简直像小喜鹊似的。

我把孩子放在他的有栏杆的小床上，由他自己在那里爬，或站起来扶着栏杆对着人们又笑又叫。我给了他一片梨，他拿在手里津津有味地啃着。

许先生说：“抱他起来，吃点什么吧？”

我说：“我们从来不抱他吃饭，等到了钟点我另喂他粥吃。”

鲁迅先生点头表示赞同地说：“这样好，这样好，习惯就要从小养成。”

许先生温和、赞许地向我笑了笑。

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楼上楼下端菜。送了几次后，我看看那不到一米见方的小桌上已摆满了，可就是没有怎么动呢！我和做完菜上来见鲁迅先生一家的妹

妹，都感到有点惶恐。

我们将妹妹向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作了介绍。我妹妹除了红着脸之外，也是说不出一句应酬话。经验丰富通达人情的许先生给我们解了围，她拉着我妹妹的手说：“快坐下，自己吃点吧！真辛苦你们了。”

我妹妹低声地说：“不会做，不好吃。”

鲁迅先生似认真似玩笑地说：“菜太多了，摆这一桌，没法都吃完呀。”同时和蔼地对我妹妹笑了笑。知道我妹妹还是一个正在读书的高中生，又随便问了几句。我和我妹妹都感到这两位长者对我们的亲切和平易，所以紧张心情一下子就被放松了，心情愉快地吃着饭。

这最后两碗菜，看来是成功的，是受欢迎的。一碗是江西土产草菇做的豆腐汤，一碗是走油扣肉，梅干菜做底。肉没有多吃，而干菜两位都爱吃。我们看到这情况，才如释重负，总算不虚此一番努力。其实我们两个单纯而幼稚的学生，要做出什么佳肴美馔来是办不到的。如果认真地做几碗家常菜还是可以的。偏偏贪多嚼不烂，弄得多而不精。如四个冷盘，记得有油汆花生米、香莴笋拌海蜇，由于许先生是广东人，就有一盘叉烧；想到鲁迅先生小说中写到过熏鱼，也买了一盘熏鱼，其实这算什么自己做的菜。还有炒菜，虽有四五样之多，中吃的实在不多。好在我们不是为了请客，鲁迅先生全家也不是来赴宴，而只是一次家庭式的聚会罢了。

而作为主人的胡风，我看他可一点没有感到紧张，或者认为菜没有弄好，他是一切照旧，平平静静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菜，自自然然地和他们谈话。

在书房里时，更是谈笑风生，常常听到他们发出的笑声。有时拿一本书翻翻看看说几句，或是从一本杂志的文章说了开去。他们的谈话，有时还夹杂着日语，可能是谈到日本哪个作家。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地谈些什么。只好像是昨天或前天谈话的继续，没有头，也好像没有尾，兴之所至，随便谈去，一点没有客套话，也没有沉思不悦、哑场的时候。这是真正朋友之间的坦率真诚的谈话。

我们先回到小房里去休息喝茶。我匆匆地吞吃了一碗饭，就抱着孩子去陪他们。许先生把孩子接了过去，夸他说：“这么久没听他哭过，只是笑，真是乖孩子。”

鲁迅先生接着说：“他长得不错，挺健康。”

海婴更是喜欢他，摸他的小脸和小手。

后来鲁迅先生说：“我们该走了。”同时站起身来准备取帽子。

胡风说：“那我去叫汽车。”

鲁迅先生说：“不用，这沪西区静安寺路一带我们很少来，带他们马路上走走吧。”

于是都站起来准备走了，可是海婴这时提出了要求：“妈妈，把小弟弟抱走好吗？”

大家先是一惊，后来就哗然大笑了。

我说：“可以，送你吧。”

他用明亮的眼睛请求似的望着妈妈。

许先生只好安慰他说：“他还小呢，还要吃奶，我没有奶喂他呀！”

我看到他的不高兴的失望样儿，赶快说：“等他大一点，会走了，我带他去和你玩，好吗？”

这时，胡风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新近拍的，孩子在后门口站在藤车上的照片，给了海婴说：“把它送你吧，你看他正对你笑呢！”

海婴接过照片，很高兴地看着，表示了满意，并且立即要妈妈放进手提包里。

我们送他们一家走出了后门，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他们要我们回去，不再送了。我想到该喂孩子粥了，就停下来和他们告别，小家伙也高兴地向他们摆着手。而由胡风陪伴着鲁迅先生一家，一直送到弄堂口。

我在后面望着他们缓缓地走着，鲁迅先生那特有的稳健的步伐，和许先生稍向前倾的身影，海婴由许先生牵着，带跳地走着。胡风在鲁迅先生身旁伴送着。

我感到他真是太幸福了，能陪伴着鲁迅先生，行走在一起。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向前向前，慢慢地远去。而这一幅同行的画面，可永远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1981年2月改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几点补遗

1981 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我曾根据胡风 1976 年写下的有关他经手鲁迅丧事的情况，加以整理成文，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1981 年第四期上。当时他正在病中，后来他病愈能阅读时，看了这篇文章，就说还有许多没接触到的，以后将重写。但直到他逝世，也没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因此深为惋惜。

这几年来，看到一些同志的回忆，现就我所记得的，勉力写几点补遗。

胡风在安葬了鲁迅回到家里时，已是深夜了。我望着他整个身体都瘫软了似的倒在藤椅上，面容很痛苦。我不敢离开他，就静静地坐在一边。突然，他像记起了什么，赶快寻找带回来的那一包东西，从里面找出一张单据交给我，说：“你替我收好吧，不要又让我搞失了。这是周先生万国公墓墓地的地契收据。”好像是六穴地或八穴地，五百来元钱。几天后，他把这收据交给了许先生。

我明确地记得（他在材料中说模糊地记得），他当时曾和我谈到，这次许先生为周先生的丧事花了约两三千元，那是周先生生前将蔡元培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编译员支付的薪金存下来的。当时周先生就说过，这钱为许先生和海婴留下，将来万一有什么事，可做生活用度。

在雪峰和许先生商量，由救国会出面主持治丧时，沈老（钧儒）曾说过，治丧费也由救国会出。但后来一切开支都是由许先生亲自付出现金的，救国会也没再提出钱的话。所以事后雪峰很不好意思地向许先生说：“救国会不出钱，只好算了，将来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

近年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先生的治丧费是救国会出的。我又特意问了胡风，这一次他很清楚地一口否定了，说：“没有这回事，救国会并没有出钱。”我想，这是可靠的。那位说出过钱的同志可能只听到沈老说过要出钱，并不知道后来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

最近读了一篇回忆雪峰同志的文章，内中提到雪峰在办鲁迅丧事时的一些情况。有一段说：“鲁迅逝世时，鲁迅派的几个青年闹得很凶，不许所谓周扬派的人

参加吊唁活动。以致他不得不准备动起武来，对其中一个闹得比较狠的作家说：‘你如果再胡闹，就把你绑起来’。”这是言过其实的。绝没有不许什么周扬派参加的事。例如，徐懋庸送的挽联照样给他挂了出来，他还参加了吊唁活动，甚至连张春桥也参加了吊唁活动。至于周扬和另外的左翼知名人士没有参加，可能是由于安全问题。

万国殡仪馆地处越界筑路的胶州路，国民党特务可以在那儿随便行动。所以雪峰只在周先生逝世当天去过一次，后几天是由胡风晚上到他家去汇报情况并接受他新的布置。他不可能当着几个青年发脾气的。可能是，胡风曾告诉他，萧军要胡风代表鲁迅晚年亲近的作家出面讲话，胡风认为这样做对团结不利，拒绝了，因此争吵了几句。后来还是决定由萧军代表四个刊物讲了话。绝没有闹得很凶的事。

顺便说一下，在移灵安葬时曾有一个马蹄形的大花圈，最近有一位热心搞鲁迅资料的同志问到我，说花圈挽带上写有十六人的名字，有些弄不清是谁。我记得是八对夫妇：路丁（王尧山）、华沙（赵先）；周文、樨玉（郑育之）；张天翼、契萌（张的前妻）；黄源、雨田；萧军、萧红；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周颖；胡风、屠琪（梅志）。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就这个机会写出来以作参考。

那是1944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时，特务当场捣乱会场的情况。我所看到的好几篇纪念文章都记得不够全面。现将胡风留下的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1944年鲁迅先生逝世纪念，还是处在不能公开开大会的情况下面。只好在百龄餐厅用茶话会的形式举行。人数限制得很少，也用不着让国民党文化官员参加。有孙夫人、沈钧儒和几个外国记者出席。但还是混进来了几个特务。

主席（沈钧儒?）致了开会词后，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说是刚从沦陷后的上海来的，他在上海时知道许广平投敌了，所以不应该开会纪念鲁迅（大意）云。这出乎我意外，动火了。我虽然不相信许广平投了敌，也只好就他的话马上站起来驳了他：“我不相信许广平投了敌，但即使如此，为什么会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卫不是孙中山的大信徒吗？但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纪念孙中山先生呢？……”

马上几个特务纷纷站起来斥责我“污辱总理”。特务发言时，孙夫人起身

退席。到我发言后引起特务斥责时，夏衍也走了。我又站起来正要反击，被几个人拉到了会场门口，从衣帽间取了帽子和手杖，还想从后面高声反击几句，但被人推出了门外。幸而冯雪峰还好，正站起来讲着什么。……

这一群特务所布置的阴谋，反而暴露了他们的鬼蜮伎俩。这事在报上也没敢登载。而我觉得应该作为史料让后人知道，国民党由于惧怕鲁迅先生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不惜采取这种卑劣手段，造谣中伤，想在先生脸上抹黑，结果反使他们自己成了见不得人的大黑脸。

1986年2月

我第一次生孩子时的几件事

——怀念鲁迅先生给予的帮助

我是1933年年底和胡风结婚的，当我们正沉醉在幸福的幻想生活中时，现实忽然对我发出了警告。三个月不到我已怀孕，并且反应特厉害，使我在街上走时常感昏眩欲倒。本来我想继续参加左联工作，还雄心勃勃想学习写作；胡风也订有计划，准备将从日本带回的一本高尔基作品的英、日文本译成中文。但从此家里将多一个小生命，我们的一切计划就会改变。

胡风当时年过而立，我年近二十，我们都还没有想要孩子的愿望，尤其是我当时是不甘心从此就在家里做家庭妇女的。这样我们就下决心将这孩子打掉（堕胎）。过去我曾听人说吃红花会造成流产，我就大量地喝红花水，结果毫无作用，只是人越来越消瘦。我不敢和我母亲说，也没有人好商量请教，只得听天由命了！

胡风着急得没办法，便向鲁迅先生请教了。

那天晚饭前，他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

“有办法了，鲁迅先生说可以找日本医生用手术堕胎。”

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怎么可以将这种私事去同鲁迅先生说。他说：

“我说了倒对了！他一听这情况就很严肃地责怪我，‘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会出事的！’后来才用缓和的口气说，‘孩子来得太早，对年轻的母亲不利，会影响工作学习。不早要孩子是可以的，最好找医生。’并且还同我一路去找了一个日本医生，说好明天下午我陪你去那里做手术。”

我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想不到先生这样的开通，这样的热心肯帮忙！

第二天下午我们先到内山书店，先生正在那里，他便陪我们去到一处日本式房子，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写“清水医院”四个大字。门开了，出来几个人，他们用日语谈了几句，先生就走了。一个瘦高挑四十来岁的人领我们进去。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我被领到里面的一间，叫我躺在手术台上，只见他取钳子、取棉花地忙着。后来我感到下体一阵剧痛，又只见医生咬着牙在用力，胡风在一旁皱着眉摇着头。我一看旁边小桌上的盘子里都是带血的棉花，几乎支持不住要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去。这时医生也住了手，喘一口气，便和胡风说了几句话，胡风只是点头。医生用棉花擦拭了我的下身，让我躺了一会，就叫我起来。我以为已完事该轻松了，谁知胡风告诉我没取出来，医生让养息几天再来。我听后很失望，但也很高兴，我已下决心再也不来了。

胡风扶我出了医院，第一句话就是：“ 不取了，我不忍心看着你这样受罪！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就热烈地欢迎他吧！”

我高兴地紧握他的手：“ 我们要这孩子，并且一定要带好他，我甘心做家庭妇女。”

“ 呵，我的小妈妈，我也一定不使你们受苦，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于是他就紧搂着我向车站走去。我们刚才所经受的身体的和精神的痛苦已被对这个未来小生命的迎接所代替。我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生活的充实和幸福！

之后我面临的是怎样带好孩子。我不愿用老辈子的办法。我既然决定放弃一切个人的要求，在家带孩子，那就要将孩子带好，使他成为一个健康、活泼、聪明的孩子。我俩去四马路找了不少家书店，只寻得几本薄薄的育儿新法之类，这是一般的常识，我感到太简单，很失望。

胡风和鲁迅先生闲谈时，对买不到好的育儿书发过牢骚。谁知几天后他就从先生那里带回一本相当厚的16开本彩色封面的书，原来是一本浙江省妇孺医院十周年的纪念册，内容很丰富，里面还有不少插图，都是有关妇女和婴儿的。但内中有几张怪胎图，什么葡萄胎、连身胎等，我每次翻到那几张时，就匆匆地翻过，不敢再看。

这书就放在我身边，经常看它，它成了我的指导老师。

对这书我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几乎闯下了祸。那是我已怀孕到九个月的时候。书上说婴儿可能随时会出生，没有准确的预产期的。一些产前征候我都记得烂熟。有一天我发现裤子上有血迹，我知道这是产前先兆，但还有一天半天的。于是我上街去买了应用的纱布、棉花、硼酸粉、来苏水之类。晚饭后还为胡风抄了他译的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

虽然那时我肚子已经隐隐地一阵阵地痛着，我总认为还没有到真正的阵痛，我不愿早去医院，一个人留在那里。胡风虽然不放心，老问我，怎么样了？我去叫车吧？我总是摇头，说过早，还没到第三次阵痛。直等到痛得坚持不住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幸好房东家有电话，只好赶快去叫来出租车。等到了医院时我已痛得站不住

了。护士进来一检查就惊呼了起来：“ 快叫医生，都四指宽了。”等医生来时一面洗手，一面就训胡风，说他太大胆，再慢一步就得生在路上。其实这不能责怪他，只能怪我太相信书本。

在医院住到第七天，我的伤口已经拆线，应该是可以回去的时候了。胡风不但没来接我出院，而且下午三点钟早已过了，他也不来看我。我是又伤心又着急，怕他路上出了什么事。快四点时，他才满头大汗地赶来，我赌气不理他，他可笑嘻嘻地对我说：

“ 为了给你带礼物来，才迟到的啊。”

“ 谁要你的礼物！你把我们母子忘了。”

“ 喏喏喏，你看这是什么？这礼物可珍贵呢，我就是为你们母子嘛。”

只见他手上举着一张花花绿绿的长方形的钞票，我奇怪地看着。他说：

“ 这是鲁迅先生刚给我的稿费，是那篇为《今日中国》写的小文章，史沫特莱给了二十元美钞。”

“ 美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它对我们倒真是一件稀有的珍贵的礼物。

胡风用它不但付了我的住院费，还为孩子买了一张白色的小铁床。我回家时，大床边放着一张小床，小宝宝安睡在那里，这真是人间最美好的家。我第一步的愿望，就是不让孩子和大人睡一张床，以养成他的独立性格。我们俩望着孩子，想着这孩子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欢乐，不由得甜蜜地笑了起来。同时想到鲁迅先生给予我们的帮助，我心里很感动。

还有一件是无意中得来的帮助，也值得一提。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按照书上所说的，每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小澡盆都买好了，第二天就开始实行。谁知这像小猫小狗似的孩子，衣服一脱，还没放到水里，就又哭又叫，双手双脚乱舞，我几乎抱他不住。我大叫着要胡风帮忙。只见他捋起了衣袖，双手将孩子接过去，又将孩子放在他的左臂上，用手掌托着孩子的小屁股。开始，孩子吓得直抖动小腿，我赶忙用双手护着，谁知一会儿孩子就安静下来了，似乎对他很放心。胡风推开我，一人像表演魔术一样，一手托着孩子，一手用毛巾蘸着水轻轻地淋着孩子，还为他擦香皂洗头，孩子不但不再哭，还显出很舒服的样儿。我像发现奇迹般的看着他，心里闪出一丝怀疑，难道他带过孩子？……

胡风似乎看出了我的怀疑，只是向我眯细着眼直笑，还逗我：“ 怎么样，孩子就是服我，你看他多乖，一动不动地让我给他洗澡。”

“ 你，你……”我生气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 哈哈哈，我的经验并不比你丰富，这是我向别人学来的，学得还挺不错，是不是？”

等到将孩子洗好包好后，他坐下来抽上一支烟，舒展一下紧张情绪，这才慢慢告诉我，是向鲁迅先生学来的。那是一次谈话时，鲁迅先生提到自己第一次为孩子洗澡时，两人都不敢也不会把孩子放在盆里，结果是请了护士来才洗成的。于是谈了护士的操作方法，胡风就是这么偷偷地学来了。

鲁迅先生后来知道了胡风偷偷地学本事，两人都哈哈大笑。因此还将给海婴洗澡量热水的温度计送给他，许先生又取出一件毛线背心，说是为黎烈文的儿子打的，他穿嫌小，送给我们孩子吧。胡风一看，比我们孩子全身还长大。他两件礼物都没有敢收，只说，海婴还需要热水温度表，我已经学会用手测温度，那背心送给更大的孩子穿吧。我听说后怪他不通人情，连“ 长者赐不可拒”都不知道。

先生送我的那本书，在我孩子出生后还是很有用处，如孩子几个月出牙，会爬，会站起来，会走路，书里都有，我就对照着它看孩子长得是否健康。还有，孩子如有点小病，如拉稀、咳嗽、感冒发烧等，我就按书里开的处方去买上几片药，吃了还真管用。

那书上说明母亲在哺乳期多半不易受孕，因此我让孩子一直吃下去。谁知他一岁后就自动不愿吃了。这样我在断奶后不到五六个月已经发现怀了孕，反应还特别厉害，使我无法做家务和带好孩子。这次我下定决心，为了孩子也要将这未成熟的胎儿打掉。只是胡风看我的身体这样衰弱，怕又像上次一样弄得出不少血还没成功。

正在犹豫时，他忽然提出，我们一同去先生家玩，我也想去看看许先生，就答应了。坐在电车上时，我还头昏目眩的，到了他们家我的精神就大好了。先在楼上听胡风和鲁迅先生谈话，许先生上来冲茶后，我就和她一同下去。这时正好海婴从学校回来，他欢快地拉住妈妈，嘴不停地说着话，而许先生是那么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认真严肃地批评几句，直到老娘姨叫他去洗手才走开。

我看了很感羡慕，就夸了几句，并且说，我的孩子还小就不听话，现在学会了走倒不肯走了，就是要你抱他到街上去。许先生笑着说：“ 你还只一个呢，以后两个三个的更会使你忙不过来。”我脱口问了一句：“ 你怎么正好是一个？”“ 我们只是……只想生一个啊，要不然我怎么照应先生和整个家务。”她的话给了我启示

和力量。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走到北四川路福民医院前不远处，有一家也写着福安还是福佑的医院，胡风说这也是一家日本医院，就领我进去。这医院比清水医院气派多了，院长也是一个中年人，但西装穿得很整齐，两大间医疗室布置得也很阔气。胡风和他谈着，似乎很友善。只见一个女护士出来招呼我，看去像中国人，还安慰我不要怕，没什么痛苦的。倒真如她所说的，在动手术时只感到肚脐里有人用力扯了一下，就听他们说，做完了。于是大小钳子都向盘里丢，另一个小盘里有着一团红红的东西，都被护士端走。

不久，她又端来盘子，里面放着拇指大一个东西，她用镊子夹起来拿给我看，并且说：这是手和脚，这是眼睛，只两个多月，还没有分男女。原来它就是从我子宫里取出的我的孩子！她问要不要用瓶装了带回去，我赶快摆手，我真不愿见这两只芝麻点大的眼睛。

我坐着休息时，看到胡风从口袋里取出三十元交手术费。而这钱又是刚才鲁迅先生转给他的一笔稿费。

这个特殊情况，胡风又作为谈话资料和先生说了。先生告诉他，不能让你夫人常做这种手术，会伤身体的，最好是避孕。并且向他介绍德国出的“ 史斑通”药片，说没有副作用，比较可靠。我们就一直用它，直到抗战时买不着这药，才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鲁迅先生送我的这本书，后来被草明要去了，因为她也怀了孕，我看她身体瘦小，实在需要这样一本书，就忍痛割爱要胡风亲自交给了她。不过随着抗战爆发，她也各处奔波，恐怕这本书也未必能保存下来。我们是不可能再见到它了！

而鲁迅先生对我们，甚至对我们的第二代那一片诚挚的关心，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事隔五十六七年，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这真是永世难忘的往事。

1991年9月3日于北京

读许广平先生的札记

上月的一天，海婴冒着暑热来看我，并交我一本练习簿。一见那字迹，我就认出来了：“这不是许先生的遗墨吗？”

“我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找出了这个本子，想让你看看，回忆一下，你该能记起一些情况。对你也可能有用。”

于是，他便复印了一份给我。

这段札记的第一部分对我就有很大的启发。那是李霁野写给鲁迅先生的信，内中特别提到，“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我觉得只有景宋女士最合适，因为她常有机会听录些你的谈话耶。”许先生很赞同，马上就决定，“先要把日常的生活事实，有可记录的摘写出来……”鲁迅先生最初的态度是不愿意，“以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是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看到这里，我的感触很深，似乎这也是对我准备写自己亲人传记时的嘱咐！由于是自己的亲人，人们写时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心，可能隐恶扬善，锦上添花，甚至还会人为拔高，溢美赞颂等等，这也应说是正常现象。鲁迅先生这一嘱咐“就坏话也得写”，对于从事传记著作的作者可并非易事，更何况写自己亲人的传记！

提到《死魂灵百图》，那还是住在霞飞路俄国大菜馆楼上的孟十还，在他家附近白俄开的旧书店中发现的。这情况被鲁迅先生得知，经查阅，绘图的作者是当时的名家，出版年代又是最早的，所以不但是精品，还是稀有的文物呢。鲁迅先生便出了一百元将它买下。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愿意出版，但觉得要印这样精美未免成本太高。于是，鲁迅先生便又拿出了一笔钱补成本，并订购了五十本书。

收到这精致的《死魂灵百图》精装本，鲁迅先生的高兴劲儿和立即自己动手“一本一本包裹起来，打算给朋友们快点收到浏览”的那种心情，只有许先生亲眼目睹记录了才能生动地反映出来。这一小段记录使人们了解到鲁迅先生对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不仅止于自己喜爱欣赏，还不惜人力财力将它出版，并赠给朋友们使他们也能喜爱欣赏。我记得，他送胡风的那本是他亲自交给胡风的，拿到家后

我俩久久地翻看欣赏着。可惜的是，抗战初起我们逃离上海时，这精装的《死魂灵百图》和精装的《死魂灵》都没能带出。后来我的同父异母哥哥怕被日伪查出连累他，就把它们连同其他书都付之一炬了。想不到，这样的被鲁迅先生视为印刷装帧最好的书籍竟遭到如此的下场！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胡风用惋惜的口吻和巴金谈起此事，这才又得到了巴金赠送的平装本。

对黎先生谈办刊物的话，这是先生办刊物的一贯主张。他自己办的《奔流》杂志，就发表过不少年轻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和朋友办《海燕》时，虽说是同人杂志，但在仅出的两期中，就有不少当时并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先生一直希望从新人中发掘出好的真情实感的作品，现在特别向黎先生提起是有原因的。当时，黎烈文正在编《中流》，鲁迅先生用别的笔名为他写了几百字的小文章，起名为《掂斤扑两》很有特色。先生这番话想是因孟十还的《作家》而发。因为孟常来信要稿，并将先生的头像放在十大世界文化名人头像中，使他很反感，因此便说了他久藏在心里的肺腑之言。

胡风一直遵循着鲁迅先生办刊物的宗旨主张，他办的《七月》、《希望》，都是不以名作家为号召，而着重从读者来稿中发掘好的作品。

许先生记的F先生就是胡风，那是无疑的。因为查日记，这些日子胡风都去过先生家里。5 月 10 日黎烈文走后，胡风晚上去了。这从一则记录可以看出，和胡风的谈话内容还是和黎烈文谈话的继续。不但是要重视新生力量，办刊物应多吸收新作家，甚至说出“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出来”。他对中国传统的老字辈占据地位不让的做法，感到多么沉痛，感到中国是多么的需要走新的道路，这也是他从封建的旧文化势力中奋斗出来的深切体会。

由这谈到杨邨人嚷嚷没有出路。他从苏区逃了出来，而说没有出路，当然是为自己辩护。他的“出路”是变节后又乱骂一通，将过错推给新生力量。

所以，先生才有感于日本的共产党员，即使转向了，但他们的思想如故。有的仍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的仍在写有思想的文章，只在对歌颂天皇和军国主义这方面表示沉默。

那以后，在 5 月 28 日和 31 日的日记上都记有胡风和雪峰一同谈话的情况，许先生没记录，日记上也没有写出。可能因为许先生不在一旁，就是在一旁也多半不便记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

读到“写文章真难，因中国文字实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这段，这样的牢骚和哀叹，我听鲁迅先生和胡风谈起过。他们还很称

赞日本人的大胆创新，敢于吸收外来字，用译音，形成本国的新字。而中国仅一个“混凝土”，就出现了不同的译法，有的译成“水门汀”，有的译成“士敏土”，最后总算成了新名词（现在是统一用“水泥”二字了）。所以，鲁迅先生和胡风都曾议论过中国字的不够用，尤其是翻译时。到后来，由于国民党书审官的“独具慧眼”，常常疑神疑鬼，写作时不得不使用“奴隶的语言”。幸好鲁迅先生还未及尝到这种难于应付的苦头。

最使人遗憾的是许先生记录得太少了。本来，她起意记录已太迟，不久先生就常在病中，她便无时间也无心来记录了。这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就只能读到这么几则了。就是这不到三千字的几段记载，都已给了我们不少启发和教益，成为研究鲁迅先生的宝贵资料。

1992年8月

鲁迅先生赠我一面镜

——纪念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

1934 年 10 月 25 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有“ 下午谈海赠镜子及蛇皮笔各一，即以镜赠谷非夫人，笔赠海婴。”

10 月 25 日是我大儿出生的日子，一定是胡风在下午去看鲁迅先生时告诉了他这喜讯，所以我得到了这份礼物。

这礼物是我从医院回来后，胡风交给我的。记得是一个美丽的盒子，里面装着一面三四寸的圆镜，但它又有着一个可以活动的柄，拉出可以拿在手里照着，也可以折叠成为镜架放在桌上，镜边似乎是奶黄色的合金制造，总之是一面非常漂亮又非常可爱的小圆镜。可惜我平生不爱对镜打扮，现在有了孩子更无心和无时打扮了。所以我见着它，是喜悦，是感激，但我没有多的机会使用它，我是忙着孩子连照镜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只是照原样，用那漂亮的盒子装着它，放在我的小皮箱里。

只在整理箱子时，才拿出来照看一下自己，也看看它，摸摸它，有时还抱着孩子一同在镜子里出现，看着孩子红润的脸色和可爱的笑容，虽然自己显得有些憔悴也是快活的。

抗日战争时，我们离开了上海，过上了逃难的生活，这面镜子在我的记忆里也就淡忘了。

1973 年后，我到四川第三监陪胡风坐牢。我在宣布没收胡风衣物时，争取到将许广平先生送的《鲁迅日记》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这样，在胡风病情稍好时，我就拿出先生的全集给他看，后来他又自动地要看日记。

我们最注意的常翻的当然是三十年代的那几本。

有一天，我看到了上面那一则日记，不但使我重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就像眼前晃动着电影似的一一在我脑中重映了一遍，并且清晰地记起了那面镜子。我不由得责怪起胡风来了。

因为抗战初起，我是先离开上海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宣战，只是卢沟桥响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